

未来10-15年中国拥有自主发展的新机遇^{*}

宋泓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抓住全球化所带来的战略机遇，中国通过吸引外资和对外开放获得了快速发展。那么，未来中国面临什么样的国内外环境、是否还有新的战略机遇期呢？本文的研究发现：在全球经济低迷、金融动荡的未来10-15年中，由于构建了强大的自主发展能力，并拥有巨大发展潜力，同时还可以抵御国内外各种风险的冲击，因此，中国拥有“自主发展”的难得战略机遇期。利用好这种战略机遇期，不仅可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也可以顺利完成工业化过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甚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跨入发达国家的门槛。

关键词：战略机遇期 自主发展 国际环境 国内能力建设 有效政府

有关贸易价值增值的研究是最近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经合组织（OEC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最新研究，除了显示中美之间的贸易差别没有传统的贸易统计得那么大以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发现是：用价值增值表示的贸易依存度大幅度降低。以2009年为例，最高的国家也只有60%左右。一些大型经济体，比如，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则非常低，分别只有8.65%、10.24%和11.12%；中国和印度也不例外，分别只有16.6%和14.61%。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道理，即：对外贸易的贡献远比人们想象得要低。因此，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发展必须建立本国的产业体系，并依靠自身的企业和产业。

那么，落后大国的产业体系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这类

作者宋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 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国家企业和产业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先进的技术、培养本国的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来逐步推进的。从几个成功发展起来的大国的情况来看，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建立出口创汇能力、引进国外技术以及本国产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非常重要。而这种机制建立的前提条件是：强有力的政府推动以及较强的技术吸收、消化能力。其中，本国社会精英阶层的图强抱负以及强力政府的有效运作最为关键。因为，即便最初没有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一国政府短期内也可以通过引进外国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功能性地帮助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吸收和消化这些进口技术；中长期则可以通过兴办教育，大批量地培养当地人才等来实现。

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一国内部的能力建设和外部环境之间的机遇及其互动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如果遇到了好的战略机遇期，并利用得好，那么，整个经济就可以获得快速的发展；反之，如果没有战略机遇期，或者没有利用好，那么，整个经济的发展就会减缓。

以战后日本的发展为例。在明治维新以来大力推进国民教育、精英们励精图治的基础上，二战后，日本首先充分利用了19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争，和美国建立了盟国关系，并实现了经济恢复。其次，1955年以后，利用相对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大规模引进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尤其是进行大规模的临海重化工业的建设和发展；1960年代，则着重引进和发展当时的新兴产业，比如电子和喷气式飞机制造等产业^[1]。到1970年代初期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日本基本上完成了国内产业体系的建设和现代化，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最后，在1970年代中期以及198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及广场协定的国际动荡时期，在欧美国家纷纷陷入滞胀状态之时，日本经济却有效抵御了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自主发展，并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

战略机遇期与一国的发展

战略机遇期，是一个国家在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中所拥有的、有可能获得快速发展的一段时期。很大程度上，这种机遇期是由一个国家的能力（利用外部条件的能力和自主发展的能力）以及外部环境所提供的机会来共同决定的，是一个

[1] Terutomo Ozawa, *Japan's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 to the West, 1950-1979*, Cambridge(Mass.):MIT Press, 1974, P20-21.

国家与其所处的内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一个国家发现和利用国际机遇的能力很弱的时候，即便是具有很好的国际环境，也很难获得较快的发展。在历史上，我们见识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即在同样的国际环境下，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脱颖而出，发展起来，大部分国家则坐失这样的机遇。在另一个极端上，如果国际环境恶劣，或者国际机遇有限，那么，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这时，即便是一个国家具备利用国际机遇的能力，也只能获得有限的发展。只有内外部两方面的条件都具备的时候，一个国家才能够获得快速的发展。这时，我们会说，该国的发展拥有良好的战略机遇期。

给定国际环境，根据把握、利用和创造战略机遇的能力，可以区分这样几种情况：其一，国内的能力薄弱，无法把握和利用外部提供的战略机遇的情形。当一个国家弱小的时候，国内发展缺少资金、技术和人才，需要大力引进和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同时，又不具备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能力。这时，国内能力建设至关重要，因为即便是有良好的外部条件，该国也不能够充分利用。

其二，国内的能力达到了可以充分利用外部战略机遇的水平时的情形。当一个国家的内部实力大大增强，并具备了一定的吸收和消化能力之后，良好的外部环境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时的战略机遇期，就主要依赖于外部环境，比如，有没有良好的引进技术、管理和人才的外部环境等。如果利用得好，一个国家就可以获得快速发展。

以建国以来中国的发展为例。建国初期的19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获得苏联156项工程援助，经济快速发展，并初步建立起较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随后的1960年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对内，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困难；对外，和苏联的关系破裂，而和西方的关系尚未建立起来，孤立无援。这一时期，中国的技术引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仅从西方国家引进了一些急需的民用项目。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绩效甚差。1970年代初期，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开始改善，并为技术引进打下较为扎实的基础。加上这个时候，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西方国家也发生经济危机。利用这些机会，中国加大了技术引进的力度和步伐。比如，1972年，先后从法国和日本引进了4套化纤和2套化肥装备等。1973年，进一步提出在3-5年内引进26套大型项目，支持农业、基础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在引进而又封闭的条件下发展的。这一时期，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限制了吸收消化能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第一，没有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以国有企业为主，缺乏自主研发能力，容易陷入到“引进—消化吸收—再引进”的重复之中；第二，受困于恶劣国际环境的限制，没有对外开放，缺乏国际竞争压力，也和国际产业发展以及技术进步的前沿发展相脱离，从而陷入到“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之中。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的改革以及对外开放使得中国国内能力的建设大大加快，国际机遇的利用能力也大大提高，技术引进和经济发展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1978年，中国和日本、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230多个项目，成交额达到78亿美元，合同数量和金额比建国以来的总和还要多。不仅如此，还建立了“出口创汇、引进技术和外资，以及国内企业和产业发展”之间的良性促进机制，并获得了快速发展。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甚至逐步获得了抵御不利国际环境冲击的能力。如1998年亚洲金融冲击下，中国采取的国内刺激措施，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采取的大规模政府刺激政策等。

其三，对外依赖减弱、自主发展能力增强时的情形。一个国家随着内部发展的自主动力逐渐增强，以及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逐步提高，对于外部环境的依赖就会减少；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掌控内外部的冲击，可以获得自主发展的新机遇。

以1997年和2008年两次大危机时候的中国刺激政策为例。实际上，这些政策都遏制了经济的下滑趋势，并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果。当然，从机制上讲，中国完全可以更多鼓励民营企业 and 市场机制的加入，也可以通过招标、提高透明性等措施减少建设中的腐败现象出现，等等。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掩盖或者否认一个事实，即：中国有能力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国内也有巨大的需求。这正是自主发展潜力的体现。

最后，当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自身的影响创造自我发展空间，或者战略机遇期。

中国所处的阶段和所拥有的新战略机遇期

中国目前处在如上的第三种情形下。

首先，经过建国60多年（包括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拥有了

强大的自主发展能力。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庞大的、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并成为世界工厂。“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已达到17.6%。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中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迅速成长起来。2013年中国大陆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达89家（含香港），比2002年增加78家，总数位列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二位。”^[1]以进出口产品的数量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制造业体系完备性，中国很早就和美国、日本以及德国一起，成为世界上产业体系最完备的国家。以1992—2008年的出口产品数量^[2]来分析，17年中，中国平均每年出口产品的数量为4742.12种，仅次于美国的4871.18种，高于德国和日本的4729.24种和4550种。而据卡雷利等人的研究，1988—2004年间，世界159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出口产品数量只有2492种。^[3]进口产品数量方面，与美国、德国和日本相比，1992—2008年间，中国进口产品的年平均数量（4798.76）处在第三位，仅次于美国（4881.88）和德国（4864.59），而高于日本（4774.18）。

目前中国处在大规模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后期阶段。建设和发展所需要的钢铁、水泥以及设计等等中国都能够自我满足。作为一个衡量指标，在国际工程承包合同的招标中，中国连续多年都保持中标金额第一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的工程建设以及配套的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中国的教育和科技体系也能够支持目前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中国可以以世界上最有效的设计、施工和成本建设成世界上最好的高铁系统、高速公路网络、机场、车站，建设世界上最漂亮的桥梁和隧道等一个个人间奇迹。简言之，中国已经具备依靠自身的能力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强大物质、技术、管理和人才基础。

其次，中国已经深深融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大家庭之中，并获得了快速发展。从1980年代中后期尤其从1990年代开始，利用亚洲四小龙产业转移的机会，中国成功地融入到东亚经济体系、甚或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一方面，中国联系着中间品和零部件的供应地——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并和这些经济体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中国联系着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并和这些国家和地

[1] “改革开放铸辉煌 经济发展谱新篇”，《人民日报》，2013年11月6日。

[2] 即：出口价值大于零的出口产品数量。

[3] Carrère, C., V. Strauss-Kahn and O. Cadot, “Export Diversification: What’s Behind the Hump?”, Clermont-Ferrand, Centre d’études et de recherches sur le développement international (CERDI, études et documents, E 2007.24).

区保持着巨额的贸易顺差。作为中介，中国既是亚洲工厂，也是世界工厂。通过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网络，从2003年以来，中国也将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纳入到这种国际生产和消费体系中来。

这样，中国一方面建设和积累了利用世界科技、管理、人才以及国际市场的强大能力和网络，另外一方面也积累和建立了雄厚的物质和金融基础，可以抵御外部环境的各种冲击。比如，外汇储备至少可以使中国免受发展中国家经常遭受的金融危机或者金融动荡的冲击，庞大制造网络体系也能够更好地抵御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这种既融入世界，同时又能够有效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是很多国家不具备的。这也是目前和3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截然不同的重要条件之一。

再次，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经过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12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只有6000多美元，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尚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国内的很多硬件，比如大城市的公共交通网络、卫生设施以及公共服务体系等建设还需要10多年时间才能够完成，二三线城市的建设差距更大。从最新公布的城镇化规划来看，中国的发展仍任重道远。软件方面，服务业部门的发展仍然滞后，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的改革还需要大力推进等等。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已经提出了扩大这些领域的开放、深化改革的具体要求和举措。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有一个坚强而有效的党和政府的领导，能够排除各种内外干扰，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心全意搞建设。

总之，经过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世界经济进入到长期低速增长状态，并且，随着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剧烈调整，国际金融市场充满动荡。在低速增长、金融动荡的环境下，一个国家能够免受冲击，并保持稳定就很不错了；而同时积累了强大的自我发展能力，并具有巨大发展空间的国家，则更是凤毛麟角。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只有这类国家可以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就是这类国家中的佼佼者。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多年中，中国所拥有的战略机遇期，更多地是一种外部机遇的话，那么，未来10-15年中，中国所拥有的战略机遇期，更多地是一种在开放条件下的自我发展机遇。作为一个中等收入的、相对开放的国家，中国既积累了强大的自我发展能力，也具有巨大的自我发展和提升的空间。因此，在未来相对较长的全球经济低速成长时期中，中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独善其身，并获

得较快的发展。这就是中国所拥有的新的战略机遇期。风景这边独好！

威胁中国新的战略机遇期的主要风险

未来10-15年中，将有不少风险会冲击中国，并有可能使中国丧失新的战略机遇期。

第一，国内的各种矛盾激化，并导致自乱，从而丧失这种机遇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尤其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一些产业被淘汰，工人要重新就业。调整过程中，不少人会失去工作，收入也会相应受到影响；另一方面，长期鼓励创业和发展的政策使得一部分人、一部分行业和地区的人先富起来，并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在这种转型中，收入分配不均、社会不公、腐败等矛盾激化的风险会加大，并有可能危及稳定的经济发展进程。如果国内不稳定，自己乱了，那么，新的自我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就会白白丧失，并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由领土争端，或者周边敌对势力的挑衅所引发的战争，导致西方国家，或者周边国家对于中国的群起攻击。

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以及影响的扩大，一些国家，尤其和中国有领土争端或者历史上有过冲突的国家感到了压力，蠢蠢欲动，试图组建各种反华联盟。比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所谓“共同价值外交”，明目张胆地包围中国，遏制中国。最新通过的防卫大纲也赤裸裸地针对中国。如果这些国家太出格，超出了中国的容忍限度，或者中国决定在领土争端采取更加主动的策略等，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局部战争，甚至多国参与的局部战争。结果，西方国家趁火打劫、群起攻之，将会使得中国建设进程被打断，并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孤立。战略机遇期丧失。

针对如上情况，中国要特别注意，并预设相应的应对战略。总体上，虽然小规模冲突是中国可以容忍和承担得起的，但是大规模的冲突以及被孤立、封锁的情形，却有可能使中国的发展陷入困境。

结论和启示——如何利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第一，一国发展中的战略机遇期，既受该国利用国际机遇的能力限制，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在内外条件都契合的时候，一国经济会获得快速发展。

第二，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强大的自我发展能力，以及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加上国内发展的潜力巨大，因此，即便是在全球经济低速增长的情形下，未来10-15年中，中国仍然拥有自主发展的难得战略机遇期。

第三，这种战略机遇期的充分利用也面临着很多风险。其中，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国内调整以及国际范围内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心和误解尤其值得关注，并预设防范议案。

中国现在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是拥有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即：现有技术积累与国内建设和发展需求之间所形成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是对于新技术的研发更加迫切——进入到产业前沿以后，很多技术不能再通过引进获得：要么是现有的技术拥有者不愿意提供，要么是中国需要的很多技术，也许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需要独立探索和突破。

那么，如何利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并促进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和经济的转型升级呢？

利用好新的战略机遇期，一方面要大大加快国内的建设和发展，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改革各种不合理的机制体制，释放和调动服务业发展的潜力和活力。另一方面，更要在对外开放中，适度、谨慎推进，保证国内产业升级的顺利实现。

未来10-15年中，中国面临的迫切发展议题包括：1) 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彻底完成工业化进程。比如，建设和完善全国性的高铁网络、高速公路网络；建设二三线城市的地铁网络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的卫生和公共服务体系；稳步推进城镇化。2) 从事关键领域和核心环节的技术攻关，顺利完善和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目前，中国一些欠缺的技术和人才，很难从国外引进，只能通过自主创新尤其是针对性的技术大攻关来培养。3) 建设和升级全国性的宽带网络等，实现信息现代化。4) 随着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事务广度和深度的扩展，以及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中国也需要建设现代化的、具有全球干预能力的军备基础。在这些领域中，中国可以进行大规模、高质量的大建设。如果能够利用好这段难得的机遇，中国就可以顺利、快速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中国还可以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落实执行，大刀阔斧地推进国内的改革：1) 在医疗、卫生、教育以及金融、电信、交通重点领域中，改革现有的经营和管理体制，促进竞争，增加供给；2) 加快建设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3) 促进国内的生产要素流动，改革不合理的定价体系。通过这种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潜力。

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既需要谨慎、适度推进，以我为主，切忌急躁冒进，也需要高瞻远瞩，长远谋划。在这个阶段上，要特别注意维护企业和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在开放过程中，以它们的竞争能力来决定开放的程度、速度和范围。不能够盲目跟进美欧国家最近通过区域合作大力推进的所谓“高质量、高标准”的大开放。开放并不是越大、越宽、越彻底越好，一定要和自己的能力相匹配。目前，中国可以推进的开放有：1) 在多边贸易的框架下，建立中国自己的普惠制体系，对不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系统性、规范性的开放优惠。2) 建立以我为主、以我为中心的区域贸易网络体系。建议主要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小发达国家推进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建设，并根据中国企业和产业能力的成长不断拓展。3) 密切观察美欧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积极研究甚或参与这类谈判，利用10多年、甚或是20多年之后的开放来倒逼国内的改革以及企业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并在多边贸易体制和多边贸易谈判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总之，在这个战略机遇时期，中国需要在一些领域进行改革，打破垄断，增加竞争，但总体上，更需要在服务业发展、技术创新以及社会保障等领域中进行高瞻远瞩的指导和干预，以实现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由中等收入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转变。■